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中国地理学史

概述清代地理学的发展

17世纪中叶，清兵入关，中国建立了新的封建帝国——清王朝。它先后经历了10朝267年（1644~1911）。在清政府统治这一时期，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社会、政治的变动相关，在清代，文化界、地理学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相融的局面。

一、传统地理学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研究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论是地志著作的编纂，还是沿革考证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清一代，先后由个人或官方组织，完成了多部全国性地理志著作。主要有《明史·地理志》；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肇域志》；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輿纪要》（120卷）；陈芳绩（？~1670左右）《历代地理沿革表》（47卷）；徐乾学（1631~1694）《輿地备考》、《輿地志余》、《輿地记要》；杨丕复（1780?~?）《历代輿地沿革表》（40卷）；段长基（1780?~?）《历代疆域表》（3卷）、《历代沿革表》（3卷）；李兆洛（1769~1841）《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卷）、《清地理韵编》（2卷），以及官修《大清一统志》等。其中尤以《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读史方輿纪要》、《历代地理沿革表》、《大清一统志》等最为重要。

在地方志方面，清王朝非常重视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为配合《一统志》的编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河南省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著天下为式，促进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现。清中叶，政府仍重视地方志的纂修，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就曾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次年（公元1729年）还颁布了规定各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之例。当时除了官方组织系统修志外，也有许多学者积极参予私家修志工作。因此，不仅出现了数千种志书，而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地方志著作。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11000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8000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5298种。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

《吉安府志》定祥序：“志例每六十年而一修”。

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振巨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理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 11000 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 8000 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 5298 种。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振巨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理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边疆域外地理研究的情况大有改变，一方面研究人员增多，二是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方向，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据对清代有关地理著作文献的分析统计，仅研究西北地区边疆史地的著作，约有 200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三联书店，1983年版。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统计为 5518 种。第 34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多人、300多种，其中80%的研究著作是在清道光以后至清末这段时间出现的。出现了黄沛翘、曹廷杰、何秋涛、魏源、徐继畲等著名边疆域外地地理研究者。著作有沈垚（1798~1840）的《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龚自珍（1792~1841）的《乌梁海表》、《蒙古图志表》、《西域置行省议》、朱一新（1846~1899）的《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1850~1926）的《东三省舆地图说》、黄沛翘的《西藏图考》、屠寄（1856~?）的《黑龙江舆地图及图说》，以及魏源（1794~1856）的《海国图志》、徐继畲（1795~1872）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舆图说集成》（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刊印）、萧应椿的《五洲述略》（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刊印）、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刊印）等。

这一时期，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士大夫倍感痛心疾首，所以，许多人是抱着“以求抚驭之宜”“徐筹制夷之策”的目的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他们或旁搜博采，援古证今；或亲历边疆实际考察。因此，这一阶段除了一般的考证、见闻记述研究外，研究工作往往是与时政紧密相关。如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中就说道：“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兼并廓尔喀、哲孟雄诸部，铁路已开至独吉岭，其言重在通商，而唐古特部众又复迭次阻挠，难保不发生变故，且边界汉番杂处，万一乘机窃发，处处堪虞，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曹廷杰在他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中，更是重点介绍山川险要以利防守，并在书中指出何秋涛之所以著《朔方备乘》，是与“俄人乘隙窥我东北”有直接关系。何秋涛自己也在该书的叙言中说，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备国家缓急之用”的。

此外，在清代的传统地理学发展中，还出现了一些汇集历代地理著述的类编型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方舆类汇编、《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以及清末王锡祺（1855~1913）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中国历代重视河渠水利事业，因此，有不少专述河渠水利，以及河流状况的著作存世。清代较之过去各代更有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当时全国河流水系状况和历代水利资料汇集的著作。主要有：黄宗羲（1610~1695）《今水经》（1卷）；姜宸英（1628~1690）《江防总论》（1卷）、《海防总论》（1卷）；傅泽洪（1640?~?）等撰的《行水金鉴》（175卷）；黎世序等的《续行水金鉴》（156卷）；齐召南（1703~1768）《水道提纲》（28卷）；王太岳（1722~1785）《泾渠志》；赵一清（1722?~?）《直隶河渠志》（132卷）；戴震《直隸河渠书》（110卷）；程瑶田（1725~1814）《水地小记》（1卷）；李元（?~1816）《蜀水经》（16卷）；陈揆（1780~1825）《六朝水道疏》；徐松《西域水道记》（5卷）；陈沣（1810~1882）《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7卷）等。其中以《行水金鉴》、《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尤为重要。

成书时间很早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在长时间中，主要靠相互传抄、翻刻流传，因此，到清代时，各种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较多。它们相互之间都有缺漏、差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中国上古、中古语言、文字变化较大，后人对古人著作的理解因时代不同，文字的解释上也各有差异；思想上的理解更是各有见解。这些都为后代阅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由

乾隆时期兴起的“考据”学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对古代著作进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义（内容）上的注释，在地理学方面，用力最勤、成绩最显著者，主要是对《禹贡》、《水经注》，以及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关于《禹贡》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程瑶田、丁晏等。清初胡渭（1633~1714）曾著有《禹贡锥指》20卷，地图47幅。搜集历代方志舆地著作史料，对《禹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注解。还对所谓“禹河”（传为大禹治水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代黄河河道进行了精密考证。此后，徐文靖（1667~1757）在胡渭研究的基础上，又旁引、参校其他版本著作，写成《禹贡会笺》12卷，总汇各种解释校注成果。程瑶田则著《禹贡三江考》，专门考释长江。丁晏（1794~1875）所著《禹贡锥指正误》，主要是对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错误进行辨析、补正。

关于《山海经》的校勘，主要有毕沅（1730~1797）的《山海经新校正》（18卷），郝懿行（1757~1825）的《山海经笺疏》（18卷）。毕沅主要对《山海经》的篇目、文字、山川等进行了考证，尤其是在山川方面，加强了地理内容的考释。郝懿行较毕沅晚，他的著作除了文字等校释外，对山川方位等论证，多与毕沅相同。

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当时用功的人很多。主要有：钱坫（1744~1806）撰、徐松集释的《新斟注汉书地理志集释》（6卷）；汪远孙（1794~1836）的《汉书地理志补校》（2卷）；全祖望（1705~1755）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毕沅的《晋书地理志新校正》（5卷）；洪颐煊（1765~1833）的《汉志水道疏证》（4卷）；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103卷）等。他们订补了《地理志》中的不少错讹之处。

关于《水经注》的校勘注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自问世以来，即被后人广为刊印、传抄、引用。到宋代，版本间已有了较大差异，所以金代开始，即有人进行《水经注》的版本、文字整理校订，但直到明代朱谋诤的《水经注笺》，都不十分精慎。到了清代，对《水经注》的校勘研究，一下成了一门用功最多的学问，几乎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十有八九都校注过《水经注》。其中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黄仪、刘献廷；清中叶有齐召南、全祖望、戴震、赵一清、孙星衍、段玉裁；清晚期有陈沆、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丁谦等。其中校注《水经注》最有名的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而尤以清中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文字、版本整理为重要。全祖望著有《全氏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戴震有《水经注》。他们通过文字、版本的比较校勘，校理清楚了《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的《经文》、《注文》相互混杂、篇目混乱的现象，基本理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水经注》版本，为以后的《水经注》研究、使用，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者除了对几种主要地理著作的校勘外，还对其它相关地理著作进行了校勘、注释、整理，特别是进行了许多地理考证工作，如：张庚（1681~1756）的《通鉴纲目释地纠谬》（6卷）、《通鉴纲目释地补注》（6卷）；江永（1681~1722）的《春秋地理考实》（4卷）；檀萃（1740?~?）的《穆天子传注》（6卷）；王绍兰的《管子地员篇注》（4卷）；马宗栻（?~1802）的《战国策地理考》；陈懋令（1759~?）的《六朝地理考》；陈揆

的《六朝水道疏》；沈钦韩(1775~1831)的《释地理》(8卷)；管同(1780~1831)的《战国地理考》；郑瓚(?~1825?)的《春秋地理今释》(20卷)；徐松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考》(2卷)；程恩泽(1785~1837)的《国释地名考》(20卷)；王鏊(1786~1843)的《四书地理考》(14卷)；丁晏的《禹贡集释》(3卷)；洪孙(1804~1859)的《补梁疆域志》(4卷)；姚燮(1805~1864)的《胡氏禹贡锥指勘补》(12卷)；陈沚的《水经注提纲》(40卷)；杜文灿(?~1887)的《禹贡川泽考》(4卷)、《毛诗释地》(6卷)、《春秋列国疆域考》(1卷)、《群经舆地表》(1卷)；何秋涛的《蒙古游牧记补注》(4卷)；李文田(1834~1895)的《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录注》；赵元益(1840~1902)的《战国策略地》(2卷)；缪荃孙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遗文》(3卷)等。特别是清末杨守敬、丁谦、王锡祺的工作最为重要。

杨守敬除有关历史地图工作外，在文字考证方面，以《水经注疏》40卷和《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最为重要。《水经注疏》博采《经》、《传》、《雅》、《记》，相互参证，校正疏理郦注疑滞，利用地志、图经反复校勘，更正郦注本身错误，同时对郦注所征引史实，皆注明出处。其用功之深，考证之详尽，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如潘存题词说：“楚北杨君惺吾（守敬）所撰《水经注释》，神光所照。直与郦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千古，大雅宏达，还我河汉”。《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是杨守敬历时30年，“五易其稿”，悉心研究的成果，该书旁征博引，广为诠释，不仅在《隋书·地理考》地名下注以今地，补叙其沿革及治所迁移，而且书其命名由来和重大历史事件，大大丰富扩充了《隋书·地理志》的内容。同时订正了书中记述，以及相关资料的许多错讹之处。杨守敬的工作弥补了《隋书·地理志》的不足，成为有关《隋书·地理志》研究的划时代之作，至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地理志》，“采用《杨考》者亦较多。”

丁谦(1843~1919)是清末以考证著称的地理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和古代史籍中的外国传考证两方面。其著述后由浙江省图书馆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印行，分为两集，称为《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或称《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其第一集收入著作17种35卷，包括：《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汉书西南夷朝鲜传地理考证》等。第二集收入的著作为：《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卷；《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12种33卷。丁谦的考证严谨、广泛、系统，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天下之奇作”，是清末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又一典型标志。

作为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图，在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除了各种地图大量出现外，最突出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和经纬绘图法在传统地图中的出现。

关于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在中国出现很早。晋裴秀(224~271)就曾绘

《水经注疏要删·潘存序》。

《隋书·地理志》注释。

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刊本目录。

《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序言》。

制过历史地理图集性质的《禹贡地域图》18篇。清代的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不仅在种类上众多，而且在质量、范围、系统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早在清初，胡渭《禹贡锥指》中就附有18幅历史地图。清道光时，李兆洛主持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以《皇朝（清）舆地图》为底本，将上自禹贡、夏、商、周、春秋、战国，以至元明各代地名注于其上，制成22幅地图，以红色印制底图（清代）、墨色标记古代地名的传统“朱墨套印”法制版。同时，又将《皇舆表》、《一统志表》中的各地历史沿革注在图上，以便相互对照，成为清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图集。此后，杨守敬所绘制的《历代舆地图》（又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更是将清代，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西方经纬度制图法在中国传统地图中的出现，除了作为独立的西方制图法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存在于清代的大量地图中之外，重要的是，在清后期的许多中国人绘制的传统地图中，出现了不少运用西方制图法的痕迹。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湖北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又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邹世诒、晏圭斋等编绘），就是将西方的经纬度和传统的计里画方法混合使用。清末，为编制《大清会典舆图》，在其所规定的制图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以传统画法为基础和对西方制图法的采用。如：既规定使用计里画方法，又要求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法。而在已编成的许多省级地图集中，都体现了这种中西制图法混用现象。如《甘肃全省舆图》、《安徽舆地图》、《陕西省舆地图》等，不仅有经纬度，还有图例方面的科学化革新，尽管这些图上的经纬度、投影法等，都极为简单、不准确，但却是中国传统地图法向近代科学制图法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耶稣会为了向外发展势力，先后多次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布道。明万历时即有不少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新知识，尤其是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aeus Ricci 或 Matteo Ricci，1583~1610年在华），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1610~1649年在华）、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n Schall Von Bell，1622~1666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1606~1620年在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99~1618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97~1654年在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59~1688年在华）等，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宣传了大量西方新知识，其中地理知识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宣传主要以一些世界地图、地理著作作为载体。

据统计，仅利玛窦在华制作的各种世界地图就有10多幅，其图名、绘

《水经注疏要删·潘存序》。

高儒：“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年第4期。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

高儒：“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年第4期。

图时间、刊刻等情况见表 1。地理著作方面有：龙华民的《地震解》；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艾儒略的《坤舆图说》、《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全图》）、《坤舆外纪》等。

通过这些地图、著作的编制、流传，主要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地球的球形体、世界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经纬度制图、投影法等西方地理、地图知识。自明末清初，这些地图、著作被反复刻印、抄录，并以它丰富的地理内容和科学方法，给当时中国的传统地理学以及地理认识以很大冲击，甚至出现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特别在绘制地图方法等方面，西方经纬度测量、投影法等，更是给中国传统“计里画方”制图学以根本否定，致使清初聘用西方传教士，采用西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经纬度大测量和全国新地图的编制活动。

清初康熙帝对地图测绘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他给《大清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曾说道：“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此后，他通过对用西方经纬度法测制的京师附近地图（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 1707 年）的亲自校勘，看到新法测绘的地图确比旧图要精确。因此，在进行了必要准备工作后，遂下令采用西法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

表 1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

图名	绘图时间	刊刻者	绘图地点	备注
山海舆地全图	1584	王泮刻版	肇庆	
(世界图志?)	1559		南昌	绘赠王多
山海舆地图	1595 ~ 1598	赵可怀刻石	苏州	翻王泮本
世界图记?	1596		南昌	王佐编制
世界地图?	1596		南昌	绘得一、二本
山海舆地全图	1600	吴中明刻版	南京	增订王泮本
舆地全图	1601	冯应京刻版	北京?	二小圈图等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李之藻刻版	北京	增订吴中明本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刻工某刻版	北京	复刻李之藻本
山海舆地全图	1604	郭子章刻版	贵州	缩刻吴中明本
世界地图?	1606	李应试刻版	北京	增订李之藻本
(坤舆万国全图)	1608		北京	诸太监摹绘李之藻本多份

自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年）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 年），康熙帝聘请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 ~ 1730）、雷孝思（Jean - BaptisteRegis1663 ~ 1738）、杜德美（PetrusJear toux1668 ~ 1720）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进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先后测绘了全国 641 个点（未含西藏）的经纬度。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地图投影法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

全国地图——《皇輿全览图》。到清乾隆时，清廷平定了新疆等地后，曾两次（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派人前往新疆测绘了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 90 个经纬点，又调整了内地省份的个别经纬点。然后以《皇輿全览图》为基础，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 1762 年）补绘成一幅《乾隆内府輿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图幅涉及范围比《皇輿全览图》扩大 1 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也成为 20 世纪初以前中国各种先进地图的蓝本。

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扩张，许多西方地理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一些地理考察家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也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将中国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探险的组成部分，这也扩大了国外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此外，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为了了解世界，也积极编写了一批世界地理著作，加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备》统计，自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到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近 60 年间，共有 468 种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属于地质地理学的就有 58 部，包括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俄罗斯总记》、英国衣丁保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艾约瑟的《冰洋事迹述略》、英国莱伊尔的《地学浅释》、吴宗廉等译的《澳大利亚新志》、日本野口保兴的《中华大地志》、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辻武雄《五大洲志》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地理、地质学家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地质和资源考察，足迹几遍中国内地，尤其是边疆各地。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他 1862 年来华，曾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上游一带地区。1904 年他再次来华，与美地理学家戴维斯（W.H.Davis）和亨丁顿（E.Huntington）考察了天山和塔里木盆地。1903 年，美国地理学家威里士（B.Willis）曾率队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陕西、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考察，归国后著有《中国的研究》一书。俄国地理学家普日瓦爾斯基（H.M.

）在 1870~1884 年期间，先后 4 次来华考察，足迹遍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藏北等广大西部地区，著有《蒙古和唐古特地区：在东部亚洲高原的三年旅行》、《从伊宁经天山到罗布泊》等著作。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 ）1892~1926 年期间，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到过青海湖及河源地区，著有《蒙古与喀木：1899~1901 年科兹洛夫的探险报告》等著作。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曾在 1860、1868 年来华，考察了中国东部各省，以及西北内陆地区，著有《中国》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成果。此外，法国人戴普拉（J.A.Deprat）等对中国西南地区、英国人麦克唐纳（D.MacDonald）等对西藏地区、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对中国西部地区，都进行过重要的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他们的考察，都采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地理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记述，并著有多种研究报告。他们的科学成果，一方面向国外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同时，往往又成为中国近代地理研究的基础，扩大和促进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如他们关于北方地文期，关于黄土成因和气候变迁，以及罗布泊地理等问题的探讨，都成为后来中国地理研究的热点，促进中国学者对科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视，加速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

三、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侵略，在中国先后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先后提出了要放眼世界，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校，改良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学习“西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在清末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翻译、编著了许多外国近代地理著作，介绍外国的地理环境、地理方法。其次，随着19世纪末新式学校的陆续开办，学校地理教育也受到重视。特别1909年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康有为倡导维新，1898年6月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京师大学堂即“新政”措施之一，于是年开办，规定设置舆地课程。这是中国政府正式规定在高等学校设置地理课程之始。1897年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于1899~1903年聘用张相文在该校教授地理，这是中国在中小学设置正规地理课程之始。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高等学堂政科课程包括中外舆地课，由中外教授教习，学制3年。其中第一年学习欧美非洲各境及群岛各境；第二年学习地质学大纲；第三年学习地文学大概。规定商务科学习商业地理学。此外规定中小学也应设置地理课程。这是中国官方颁布的第一个学堂章程。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等拟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分为8门专业学科，其中经学、文学、格致、农、商5科都设地理课程，在文学科下又设有中外地理专业，规定学制3年。其课程有：地理学研究法、中外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等。地理学研究法主要讲习中国与外国、气候与地理、财政与地理、海陆交通与地理、历史与地理、动植物与地理、文化与地理、军事与地理、风俗与地理、工业与地理的关系。开设的自然地理课程有：地质学、地图学、气象学等。《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在进士馆、译学馆、师范馆开设有关地理课程（见表2）。

表2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科地理课程

课程 科别	主 课	辅助课
文 科	地理学研究法、中国今地理、外国今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	地质学、地文学、地图学、气象学
进士馆	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界务地理、商业地理	
译学馆	中国地理、亚洲各国及大洋洲地理、欧洲各国地理、非洲及美洲地理、地文学	
师范馆	亚细亚洲、大洋洲、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亚米利加洲	

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906 年清政府又制定了《优级师范选科章程》，规定优级师范以培养中小学教师（“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为对象，分本科与预科两科，其中本科学制 2 年。规定开设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各洲分论、地质、地文和人文地理等课程。预科一年毕业，规定每周要学习世界地理大要 3 课时。

以上规定，本世纪初陆续在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如京师大学堂自 1902 年起正式招收学生（师范馆 79 名，仕学馆 57 名），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的 9 年间，共有毕业生 306 名、未毕业生约 230 名，都受过正规的地理教育。其各年级设置的地理课程情况如表 3。其它如上海南洋公学等都开设了相应的地理课程。

表 3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地理课程

	师范馆	仕学馆
第一年	全球大事、本国各境、地图（2）	全球大事、本国地理（3）
第二年	外国各境、地图（2）	外国地理（3）
第三年	地文地质学（2）	地文地质学（3）
第四年	教地理之次序方法（2）	

注：括号内数字为周学时数

由此表明，从本世纪初以来，近代地理学被作为一门学问开始正式列入中国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之一，并得到一定的实施。

近代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为近代地理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做出重要贡献的先驱人物，首推张相文。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公元 1866 年 5 月 29 日）生于江苏省桃园县（今泗阳）县东门外南园。他自幼好学，博览史传，识见卓越。后师事胡和梅、王先谦、王懋琨等，学问大进，名噪江淮。甲午战争后，他萌发了研究地理学的决心，积极学习外国地理等知识。1899 年起，在上海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程，并参照日本等国外地理教科书资料，亲自编写地理教材，于 1901 年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2 册，南洋公学出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4 册，上海兰陵出版社），这是中国自编地理教科书的嚆矢，而且影响很大，总发行量在 200 万部以上。1908 年，张相文还编著出版了《地文学》一书（上海文明书局）。这是中国第一本普通自然地理著作。全书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 5 编。直至今日，普通自然地理教材的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一框架，特别是在此之前，国内外的自然地理著作内容仅限于无机自然界，而张相文却新增生物界一章，把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联系起来，这在世界地学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在这本书里，他“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吸收国外先进的地理学理论，对自然地理许多方面的现象与事实，进行科学的因果分析，试图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并在《地文学》绪论中明确指出：“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普通自然地理学的独立，是新的近代地理学区别于旧地理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张相文《地文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此外，张相文还著有《地质教科书》等，在地质地貌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张相文不仅在齐鲁、冀北、内蒙、山西、热河等地作过许多地理考察，而且在

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

张相文：《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 年版。

河套地区进行过垦殖试验，努力使地理研究与改造社会相结合。他担任中国地学会会长长达 20 年之久，为创建中国的近代科学地理学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著述甚丰，反映地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大都收集在《南园丛稿》一书中。

光绪末年，面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场所和瓜分的对象，“非惟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创办学会，研究地学，拯救中国。张相文也深感“博稽载籍，既言人人殊，耳目所接，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又苦其有限。”因此，他早“怀集思广益之心”，积极酝酿组织地学研究团体，促进地理研究的迅速发展。1909 年 9 月 28 日，他邀请白毓昆、张伯苓、陶懋立、韩怀礼等地质和地理学家、教育界官员及各校师生 100 多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该会于 1912 年迁往北京）。会上张相文被推选为会长，白毓昆为编辑部长，吴鼎昌为干事部长，任宪吉为总干事员。地学会成立后，将同好团结在一起，又陆续吸收了许多地理、地质方面的专家，使中国研究地学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0 年春，张相文年事已高，会长改由张溥泉担任。1937 年 11 月 10 日，中国地学会在北平团城举行会议，通过张星烺、黄国璋、王益崖、张印堂、毛子山、王献乌、王华隆、刘雪崖、黄玉善、白眉初、洪绂、王成祖、葛绥成、孙宥越、陈宗经为理事，张星烺为理事会主席。

保存在《地学杂志》第一年第一号中的“中国地学会启”，系统阐述了中国地学会的办会宗旨。全文如下：

中国地学会启

人生缘大地以为食息，聚国族以谋生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则每每员舆，实与民族为消长，日辟百里，日蹙百里，固随其人自取，然溯其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其影响遂被于国家，其祸端并延于种族，此亦物竞天择之公例矣。

近世以来，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呜呼，惰农荒亩，邻犁侵耕，老渔醉眠，窃人割网，同处漏舟之中，共集危巢之下，时势所迫既如此矣，岂得以抱膝空山，行吟泽畔，如秦人视越人之肥脊，漫然无慨于其心耶。顾今日学校渐兴，言教育者，既以地理为重要学科，缀学之士亦竞竞焉，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若网在纲，而以视西人之予海陆形要，实地探测，无不可以资生利用者，犹千百之能十一，岂非以幅员辽阔，调查犹有未周者乎。

夫环球交通，藩篱尽撤，海氛不靖，陆险亦夷，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而欲举地理密切之关系，编辑成书，贡之当世，博稽载籍，既言人人殊，耳目所接，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又苦其有限，研究地学之难，固苦是哉。虽然乌获举鼎，十步而喘，弱夫百人负之而趋，良工造车，三月不成，漆斫不兼，旬日而就，天下事独立则难，分工则易，昭昭然矣。以故东西各国，考查地理，罔不有正式集会，领之以亲贵之官，辅以探险之队，诚重其事而分其任也。我国民何遽让此。今与海内诸君子约，仿彼之例，组成中国地学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籍收增壤益流之效，则庶几山川、扼塞、河渠、水利、原

隰、土宜、疆域、险易、方物、息耗、交通便否，皆有以周知其故，而发抉搜剔，靡使内有利蕴，外有孽媒，则裨益于学术、政治者，岂浅鲜哉！

嗟乎，西力东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场，数年以来，非惟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凡我同志，抚丘墓之墟，怵陆沉之祸，果有热诚提倡，谋所以交通而启牖之者乎。仆等不敏，窃愿馨香顶礼以迎之，谨具简章于后，惟海内宏达赐教正焉。（以下为《中国地学会简章》，略）。

中国地学会还开展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如邀请外国学者讲学、翻译外国地理著作、派员参加国际地学会议、开展学术考察、讨论。还出版会刊《地学杂志》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早期发展。

《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会联系同好、扩大影响的重要桥梁，也是报导地学发展状况、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它以刊登“地学上最新之发明”为主，“选择材料力求新颖”。较之传统的地理文献，它是一种全新学术刊物。1911年7月出版的《地学杂志》刊登了一则地学会的有奖征文启示，列出了有关地学的3类25个问题，涉及到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医学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等众多领域。

由上述可见，20世纪初，无论从地理教育、地学组织，还是当时地理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课题，都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萌发。

沈之洵：“续刊《地学杂志》叙”，《地学杂志》，1929年第1期。

“《刷新内容》广告”，《地学杂志》，1921年第12期。

上 篇

地理著述

第一章 地理总志编纂的成就

总志是以全国范围为记述对象的地理志。本章论述《明史·地理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城志》、《读史方輿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学术成就方面超越了以往同类型的志书，或者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它们不仅在地志编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地理文献宝库中的珍品。这些著作情况颇不一致，今存《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容完备，卷帙齐全；《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城志》已有缺佚，并非足本。而《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的体裁，属于表而不属于志，但因其所述内容皆为历代政区沿革，故亦暂且归入总志论述。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一、《明书》、《明史稿》和《明史》中的地理总志

清初修纂过 4 部明史，它们是傅维麟的《明书》、万斯同的《明史稿》、王鸿绪的《明史稿》和张廷玉的《明史》。万斯同的《明史稿》今已不传，姑且不论，其余 3 部皆有地理志。这 3 部地理志各有特点，大体愈后愈精，而以《明史·地理志》最佳。

（一）《明书·方域志》

作者傅维麟（？~1666）原名维楨，字掌雷，号歎斋，直隶正定府灵寿县（今河北灵寿县）人。明崇祯壬午（公元 1642 年）科举人，清顺治丙戌（公元 1646 年）进士。寻选入翰林，授编修，分修《明史》。他历任东昌兵备道、少廷尉、太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通政使、户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官至工部尚书。傅为官有德政，任东昌兵备道时，驻扎临清，临清地当水陆要冲，供应频繁，百姓不胜负担，他每“设法供应，不令民间输半菽，齐民感之”。顺治十一年（公元 1654 年），“山左大饥，（傅）施粥设赈，安集流亡，赖以活者数万人”。当时“屯田为民累”，傅作《屯田苦民书》，御史悉以入告，后“尽除之”。为官之余，他广泛收求明代遗书、家乘、文集、碑刻共 300 多种 9000 余卷，经过爬梳整理，考订异同，著成《明书》171 卷。

《明书·方域志》共 5 卷。首载总论，次述 2 京 13 布政使司，殿以边关 9 镇。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同上。

同上。

总论不长，共包含 4 层内容。一述明代疆域，“纵一万九百里，衡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二述明代编选地志图籍的梗概；三述纂修《明书·方域志》的依据，“惟以《大明会典》为正，而参互诸书、群著于谱”；四述明代政区，“约计南北直隶府二十二，州三十六，县二百一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十有三，领府一百三十八，州一百四十六，县九百四十三，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六”。

明代政区分为布政使司、府（州）、县 3 级。明初，13 布政使司分辖道，“道”是监察区，亦分领府（州）县。《明书·方域志》以明初 13 布政使司所辖各道为单位，叙述所属府的天文分野、历代沿革、民情风俗及所领县。各布政使司皆有一篇区域地理总论，阐述该区山川形胜、交通、出产、贡赋、土壤、户口和各道统领府（州）县的情况。记述府（州）、县 2 级地理内容时，详于府（州）而略于县。记述各府沿革、天文分野、山川形胜、历史事件和民情风俗的文字，多达数百言，而记述县仅举名称，罕有其它内容。

《明书·方域志》依据的资料，虽“以《大明会典》为正”，然以万历重修《明会典》校之，多不相同。现将 2 直隶 13 布政使司所领府（州）县统计数字，列表比较如下（表 4）：

表 4 《明书·方域志》、《明会典》所载府州县比较表

	2 直隶			13 布政使司					
	府	州	县	府	州	县	军民府	宣慰司	宣抚司
明书·方域志	22	36	213	138	146	943			
明会典（万历重修本）	22	36	222	123	209	943	13	8	4

《明书·方域志》所载各道以及所领府（州）县，与清龙文彬《明会要·方域》也不完全相同。现将《明书·方域志》的内容叙列于后，并与《明会要》比较如下：

浙江省分道五：杭严道领杭州府、严州府；嘉湖道领嘉兴府、湖州府；宁绍道领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衢道领金华府、衢州府；温处道领温州府、处州府。（《明会要》卷七十三同）

江西省分道五：南昌道领南昌府、瑞州府；湖东道领广信府、抚州府、建昌府；湖西道领吉安府、临江府、袁州府；九江道领九江府、饶州府、南康府；岭北道领赣州府、南安府。（《明会要》卷七十三同）

湖广省分道七：武昌道领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荆西道领承天府、德安府；上荆南道领荆州府、岳州府；下荆南道领襄阳府、郢阳府；湖北道领常德府、辰州府、靖州；上湖南道领衡州府、永州府、郴州；下湖南道领长沙府、宝庆府。另有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永顺军民指挥使司、保靖军民指挥使司。（《明会要》卷七十三“承天府”作“安陆府”；未叙列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永顺军民指挥使司、保靖军民指挥使司）

山东省分道三：济南道领济南府；海右道领青州府、登州府、莱州府；东兖道领兖州府、东昌府。（《明会要》卷七十三同）

福建省分道四：福宁道领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武平道领邵武府、延平府；建宁道领建宁府；漳南道领汀州府、漳州府、福宁州。（《明会要》卷七十三漳南道无福宁州，余同）

山西省分道四：冀宁道领太原府；河东道领平阳府；冀北道领大同府；

冀南道领潞安府、汾州府、辽州、沁州、泽州。（《明会要》卷七十三冀南道“汾州府”作“汾州”，余同）

河南省分道四：大梁道领开封府、归德府；河南道领河南府；汝南道领南阳府、汝宁府、汝州；河北道领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明会要》卷七十三河南道领河南府、汝州；汝南道领南阳府、汝宁府，余同）

陕西省分道六：关内道领西安府；关西道领凤翔府、平凉府；关南道领汉中府；河西道领庆阳府、延安府；陇右道领巩昌府、临洮府；西宁道领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后卫、中屯卫。另有宁夏中卫、洮州卫、岷州卫、河州卫、靖虏卫及陕西行都司。（《明会要》卷七十三作分道五，无西宁道所领诸卫、宁夏中卫等五卫及陕西行都司，余同）

四川省分道四：川西道领成都府；川北道领保宁府、顺庆府、潼川州；川东道领重庆府、夔州府；川南道领叙州府、马湖府、嘉定州、镇雄军民府、遵义府、东川军民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龙安府、眉州、邛州、泸州、雅州。另有永宁宣抚司、西阳宣抚司、石柱宣抚司、黎州安抚司、梅邑洞长官司、平茶洞长官司、天金六番招讨使司、松潘指挥使司、建昌行都司、垒溪守御千户所。（《明会要》卷七十三作分道五，川西领成都府、龙安府及潼川州；川北道领保宁府、顺庆府；川南道领叙州、马湖2府和镇雄、东川2军民府及嘉庆、眉、泸、邛4州；另有上川南道辖雅州府及建昌行都司，无永宁宣抚司等10卫所，余同）

广东省分道五：岭南道领广州府、韶州府、南雄府；岭西道领肇庆府、高州府；岭东道领惠州府、潮州府；海北道领雷州府、廉州府；海南道领琼州府、罗定州。（《明会要》卷七十三海南道无罗定州）

广西省分道四：桂平道领桂林府、平乐府；左江道领南宁府、浔州府、太平府；苍梧道领梧州府；右江道领柳州府、庆远府、镇安府、思恩军民府。另“有州十一”，实载十：田州、归顺州、利州、奉议州、向武州、都康州、龙州、江州、思陵州、都祥州。另有上林长官司、安隆长官司、直隶布政使司。（《明会要》卷七十三右江道领柳州、庆远、思恩、思明、镇安5府，无田州等10州）

云南省分道四：安普道领云南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军民府；临沧道领临安府、澄江府、广南府、广西府、元江军民府；洱海道领楚雄府、蒙化府、永宁府、顺宁府、景东府、姚安军民府、武定军民府；金沧道领大理府、永昌军民府、鹤庆军民府、丽江军民府、北胜州、新化州。另有者乐甸长官司、澜沧卫、孟定府、孟良府、威远州、湾甸州、镇康州、大侯州、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大古喇宣慰使司、底马撒宣慰使司、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州宣抚司等。（《明会要》卷七十三无临沧道；安普道内有新化州；洱海道内有镇沅州）

贵州省分道五：贵宁道领贵阳府、贵州宣慰司、金筑安抚司；思石道领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都清道领镇远府、黎平府、都匀府；新镇道领平越府、镇宁州；威清道领凯里安抚司、普安州、永宁州、安顺州。另外威清卫、平坝卫、安庄卫、普安卫、普定州、安南卫属于威清道；新添军民指挥使司、龙里军民指挥使司属于新镇道；都匀卫、毕节卫、清平卫、乌撒卫、兴隆卫、赤水卫属于都清道。（《明会要》卷七十三无新镇道；贵宁道无贵州宣慰司；亦无威清道所辖诸卫）